

32 走出国门

——容闳与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学生

海外留学,这在当今中国是政府支持、民众向往的时髦事业。但在一百多年前,却被很多人视为畏途。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学生的派遣及其遭遇再次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艰难与曲折。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在中国兴起。洋务派在创办近代军事、民用工业的过程中,需要大批通晓洋务的人材。他们在兴办新式学堂的同时,也开始筹划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以便更直接、更便利地向外国学习。

1868年经美国人蒲安臣之手签订的《中美续增条约》第七条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亦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这就为赴美留学提供了条约依据。同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容闳,抱着“教育救国”的宏愿,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了派学生出国留学的计划。

容闳(1828~1912年),广东香山南屏镇(今



属珠海)人。幼年家贫,1841年入澳门马礼逊学堂读书,1847年随美国传教士勃朗赴美留学。先在马萨诸塞州入孟松中学,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入学后,他生活极为俭朴,洒扫拂拭、劈柴生火等劳动都自己干,“雪深三尺,亦必徒步”,还不断为人工作,以取得必需的零用钱。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他坚持苦学,“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无余晷为游戏运动”。由于成绩优秀,“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容闳:《西学东渐记》)。1854年,容闳以优异成绩毕业。他放弃了在美的舒适生活,决心回到苦难深重的祖国,实施他的“教育救国”计划,让更多的中国人像他那样接受文明教育。

1870年,容闳作为曾国藩的翻译赴天津处理天津教案。他再次鼓动丁日昌去说服曾国藩派遣留学生,最后曾国藩同意了容闳的主张,与李鸿章联名上奏清廷,得到批准。这样,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的派遣提到了日程上来。

曾国藩、李鸿章根据容闳的建议制订了《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十二条,主要内容有:(一)每年选送幼童30名到美国学堂学习,4年共派120名。(二)幼童从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处挑选,年龄为十三四岁到20岁为限。(三)肄业年限为15年,毕业后回国听候派用,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或独自先回另谋职业。(四)赴洋幼童学习一年后如品德不端或身体不适,应由驻洋委员随时撤回。

挑选幼童出洋肄业,诚如曾国藩所说:“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在当时社会风气十分闭塞的情况下,大家子弟不肯远适异国,应募者多为衣食生计而来,被认为是“飘泊无赖、荒陋不学之人”。由于应募者很不踊跃,不得不放宽年龄限制,10岁的也收了,还不足额,容闳又到香港去挑选几个。

1872年8月12日,第一批30名幼童由监督陈兰彬、副监督容闳带队赴美留学。1873年、1874年、1875年,第二、三、四批



各 30 人相继成行,派遣工作算是顺利完成了。

幼童到美国后,最初被安置在哈佛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人家里,每家二三人,分散居住。到能听懂用英语讲课时,进入当地的小学、中学,然后分别报考高等学校,接受专门教育。他们在美国的表现堪称良好。耶鲁大学校长卜德等联名致函总理衙门说:“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国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闲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内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容闳:《西学东渐记》)1876 年,哈佛举行美国独立 100 周年纪念博览会,幼童们受到美国总统接见,他们的学习作业在博览会上展出。

幼童们在美国,日受美国教育的陶冶,经常和美国人交际,学识随年龄而俱长。他们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合,喜爱各种健身运动,跳踉驰骋,不复安行矩步。幼童们思想言行的“自由化”,引起了留学监督陈兰彬的极大不满。此人顽固守旧,对西学一窍不通,他处处与容闳作对,把留学生的种种进步视为离经叛道。他奏报清廷,告发容闳将留学生引入歧途,诬蔑留学生在美放荡不轨。清廷竟相信陈兰彬的谎言,于 1876 年将其调为驻美公使,容闳调为驻美副使,容闳一再上书要求仍做留学生的管理工作,遭到拒绝。第二任留学生监督区谔良、第三任监督容增祥回国后都指责留学生,非难容闳。留学生的前途蒙上厚重的阴霾。第四任留学生监督是翰林院编修吴嘉善,他一到美国,便把留学生招来训话,因为留学生见面时不行跪拜礼,他恼怒异常。从此他处处吹毛求疵,并向国内打小报告,说容闳如何不尽职,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说留学生专好游戏运动,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且已多半入耶稣教。在陈兰彬、吴嘉善这伙人的合力攻击下,清廷认为留学生已步入



歧途,于1881年下令将留学生全部撤回。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学生就这样“夭折”了。黄遵宪在《罢美国留学生感赋》一诗中悲愤写道:“郎当一百人,一一悉遣归,竟如瓜蔓抄,牵累何累累!”

留学生回国后,受到清政府的冷遇。他们一到上海,即由水兵“押解”至衙门后院,等候分配工作。为了防止他们潜逃,派人看守,不准外出。在分配工作时,完全不考虑各人所学专业和个人爱好,随便将名单一念,即各奔去所。尽管如此,这批留学生仍运用他们在美所学到的科学技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成绩。连李鸿章都承认这些学生“分派各处当差,均能始终勤奋,日进有功”。西洋教习及泰西各国水师官兵也认为这些学生“造诣有得,足供任使”。李鸿章因此得出结论:“中国选募学生,肄习西学以图自强,实为目前当务之急”,“选募学生出洋肄业西学,培养人材,实为中国自强根本”(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可惜有李鸿章这种认识的人太少,否则留学运动何以会半途而废呢?

在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学生中,出现了一些外交家、教育家和铁路、电报、开矿等方面的技术专家。如唐绍仪当过内阁总理,梁敦彦、梁如浩、蔡廷干都当过外交总长,蔡绍基当过北洋大学校长,广国安当过清华学堂负责人,钟文耀当过上海华商银行行长,吴仲贤任过江海关监督,詹天佑设计过京张铁路,邝荣光发现了湘潭煤矿。还有的人投身海军,在中法、中日海战中为国捐躯。更多的留学生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工作,为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而殚精竭虑、无怨无悔。

中国近代第一次派遣留学生,虽有始无终,中途夭折,但意义和影响不可低估。它是中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又一次具体实践,是对那些坚守“夷夏之防”的顽固势力一次沉重的打击,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启蒙作用,开启了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先河。就在第一批留学生派遣后五年,即1877年,福州船政学堂派遣35名学生赴英、法留学,他们回国后成为福州船



政局和北洋水师的骨干力量。参加甲午中日黄海大战的 12 艘北洋水师船舰的管带有一半是首届船政学堂留学生。严复更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成为中国近代精通西学第一人。此后中国赴欧美、日本的留学生更是络绎不绝,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留学运动。这些怀抱爱国之心的留学生,在国外不仅学习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思想,而且通过中外对比,更清楚地认识到清政府的腐朽本质,很多人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中国近代许多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都是从留学生中成长起来的。追本溯源,中国近代第一次派遣留学生功莫大焉。容闳为之而付出的巨大心血更值得后人缅怀和追忆。